

·名人手札·

薛福成致袁昶书札五通

谢冬荣 石光明

薛福成(1838—1894),字叔耘,号庸庵,江苏无锡人。同治间以副贡入曾国藩幕府,参与“剿捻”、查办天津教案等事宜,光绪元年以知州入李鸿章幕府,十年授浙江宁绍台道,十四年任湖南按察使,后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等国。薛福成纵览经史,好为经世之学,擅长办理外交。他一生著述丰富,《庸庵全集》收录了他所撰的《庸庵文编》四卷、《续编》二卷、《外编》四卷、《海外文编》四卷、《筹洋刍议》一卷、《浙东筹防录》四卷、《出使日记》六卷、《续刻》十卷、《出使奏疏》二卷、《出使公牍》十卷等十种书。

袁昶(1846—1900),字重黎,一字爽秋,原名振蟾,浙江桐庐人。光绪二年进士,历官户部主事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、徽宁池太广道、江宁布政使、太常寺卿等,因力主镇压义和团而下狱被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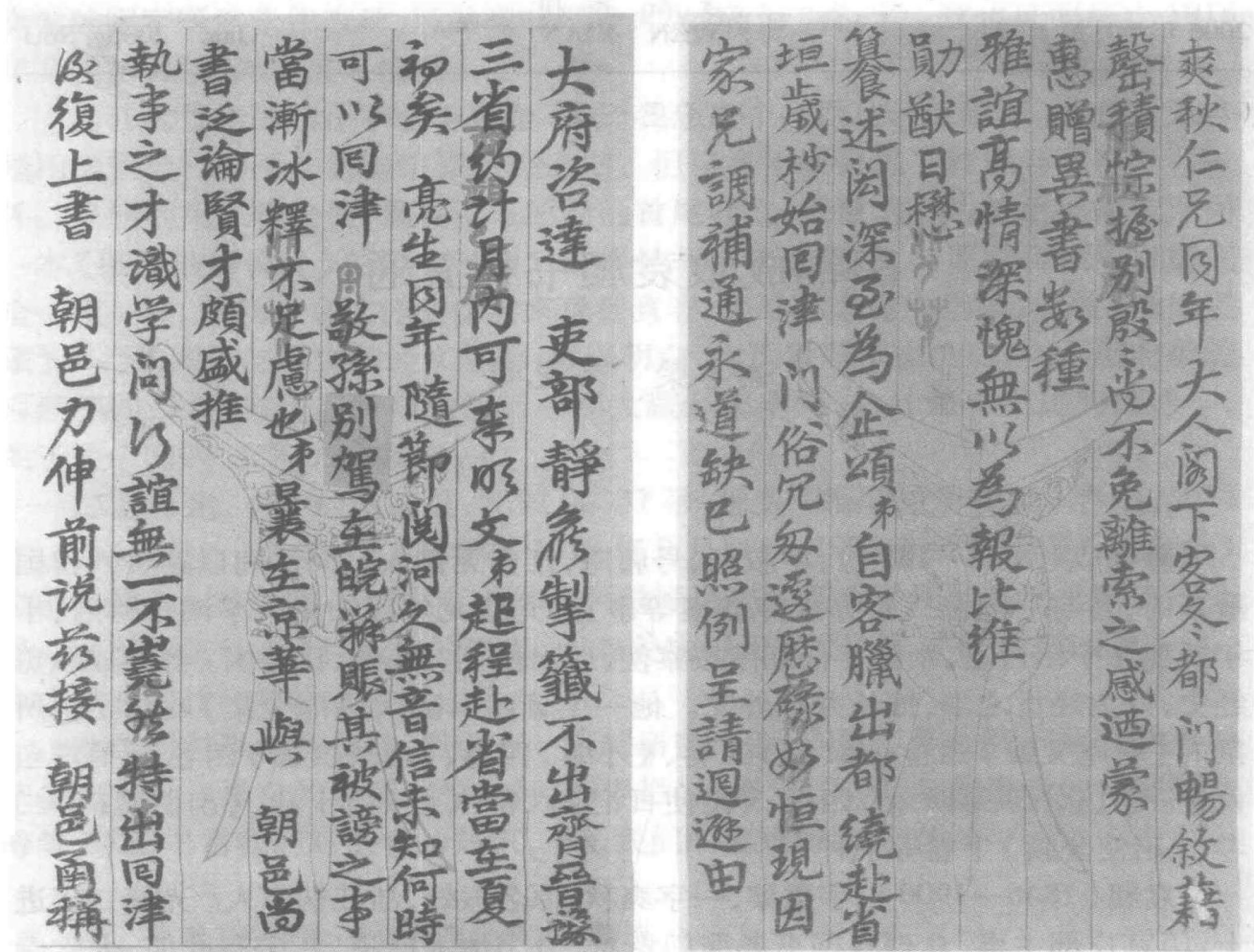
本馆庋藏有《袁昶藏名人手札》稿本十二册,乃袁氏手辑友朋所致书札,其中多为晚清时期政治、军事、学术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人物。本文所收五通薛福成书札即是从中辑出,均未收入《庸庵全集》。第一、二通作于光绪九年(1883),当时薛福成正在李鸿章幕府;第三通作于光绪十年,第四、五通作于光绪十一年,当时薛福成正在浙江宁绍台道任上。袁昶在户部任职多年,光绪九年春,他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,同年冬补授。此时正值法、越交战之际,李鸿藻奏设海防文案处,“以公司机宜文字,章奏咨札咸出公手。”^①书札的内容多涉及中法战争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现略加整理,以供参考。

—

爽秋仁兄同年大人阁下(见图一):

客冬都门畅叙,藉罄积悰,握别殷殷,尚不免离索之感。迺蒙惠赠异书数种,雅谊高情,深愧无以为报。比惟勋猷日懋,纂述闳深,至为企颂。弟自客腊出都,绕赴省垣,岁杪始回津门,俗冗匆遽,历禄如恒。现因家兄调补通永道

^①袁允桷等编:《太常袁公行略》,清光绪三十一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,第3页。



图一

缺^[1]，已照例呈請回避，由大府咨達吏部^[2]，靜候掣籤，不出齊晉豫三省，約計月內可奉明文。弟起程赴省，當在夏初矣。亮生同年隨節閱河^[3]，久無音信，未知何時可以回津。敬孫別駕在皖辦帳^[4]，其被謗之事當漸冰釋，不足慮也。弟曩在京華與朝邑尚書^[5]泛論賢才，頗盛推執事之才識、學問、行誼，无一不峯然特出。回津後，復上書朝邑，力伸前說。茲接朝邑函，稱台端學識淹雅、事理明達、現常煩以公務等語，足見豪傑處世，一逢哲匠如朝邑者，則脫穎而出，但恐郎署浮沈，尚未能大展驥足耳。茲偶檢得拙文一篇，尚系五六年前為傅相^[6]代作者，因其稍切時弊，寄呈一閱。彼此至好，无所隱避，幸秘之，勿以示人也。肅泐，敬頌台安，諸惟荃鑒不宣。年愚弟薛福成頓首，三月初八日。

注：

[1] 《清史列傳》卷 58《薛福成傳》：“（光緒）九年，以胞兄薛福辰官通永道，循例回避，改掣河南。”（中華書局，1987 年版，第 4600 頁）

[2] 大府：一般指上級官府，明清時也稱總督、巡撫為“大府”。

[3] 朱采：（1833-1901），字亮生，浙江嘉興人，曾參李鴻章、張之洞幕府，光緒九年任山西汾州知府，下一通書札言“亮生抵晉，已于九月間履任”即是指其任此職事。

[4]“敬孙”，未详其名，与第四通所言“袁敬翁”当指同一人。《袁忠节公遗札》（民国三十七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）收四十余通袁昶致袁敬孙的书札。吴士鉴在《跋》中谈到：“袁敬孙观察久官畿辅，以经术饰吏治，由牧令荐擢至道员，为李文忠公所激赏，特疏保荐……观察与桐庐袁忠节公为族昆弟，道义切劘，讲求经世之学，公于观察之才识学行奉以为师，倾挹之诚，溢于言表。”袁荣叟在《跋》中称“敬伯不幸早逝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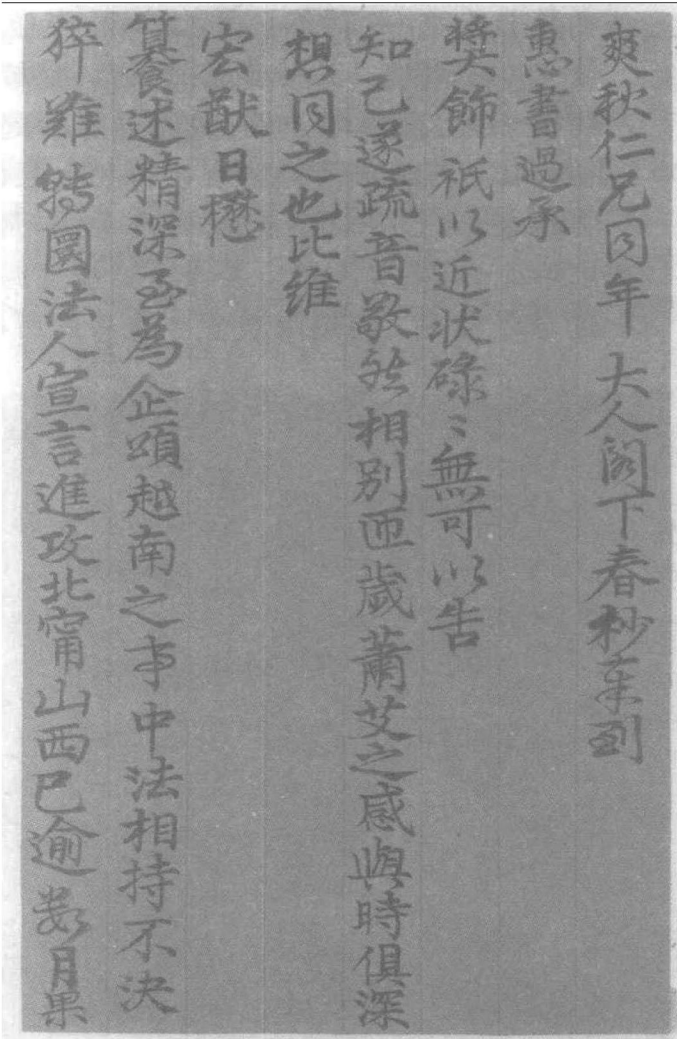
[5]朝邑尚书，即阎敬铭（1817-1892），字丹初，号约庵，陕西朝邑人，以籍称阎朝邑，光绪间官户部尚书。

[6]傅相，即李鸿章（1823-1901），字渐甫，号少荃，安徽合肥人，累官北洋大臣、太子太傅、大学士，封肃毅伯。

二

爽秋仁兄同年大人阁下（见图二）：

春杪奉到惠书，过承奖饰。只以近状碌碌，无可以告知已，遂疏音敬。然相别匝岁，萧艾之感与时俱深，想同之也。比维宏猷日懋，纂述精深，至为企颂。越南之事，中法相持不决，猝难转圜。法人宣言进攻北宁、山西已逾数月，果尔则滇粤诸军当与开仗，万一构衅，则津沽防务最为紧要。此间经傅相布置多年，似较他处为严密。所可虑者，台湾诸岛耳。近来都下议论如何？诸陈封事者有良策否？执事宣劳农部，建树益隆^[1]。前接朝邑尚书来函，盛有推誉。冬初部中出缺甚多，想指顾可望真除，殊为驰念。弟自回避，签发河南，正拟请咨赴省，又经傅相奏请，暂留北洋差遣^[2]。然于本省候补之资不免耽误，久留在此，殊属无谓。而北洋又正值多事之秋，不便言去，只可稍缓，再作计议耳。兹有启者，弟前考明各省财赋总略，惟于甘肃、云南、广西、盛京四省近年所收地丁实数未得其详，又山东、甘肃、新疆、云南近来岁收厘金之数亦难知其确数，拟恳执事查明见示。闻光绪八九年各省总册尚未到部，如能将册报较近之年各省地丁厘金收数开示梗概，尤深感幸。亮生抵晋，已于九月间履任，必



图二

可造福一方,宏此远谟也。肃泐,敬请台安,并颂潭祉不具。年愚弟薛福成顿首,十一月十八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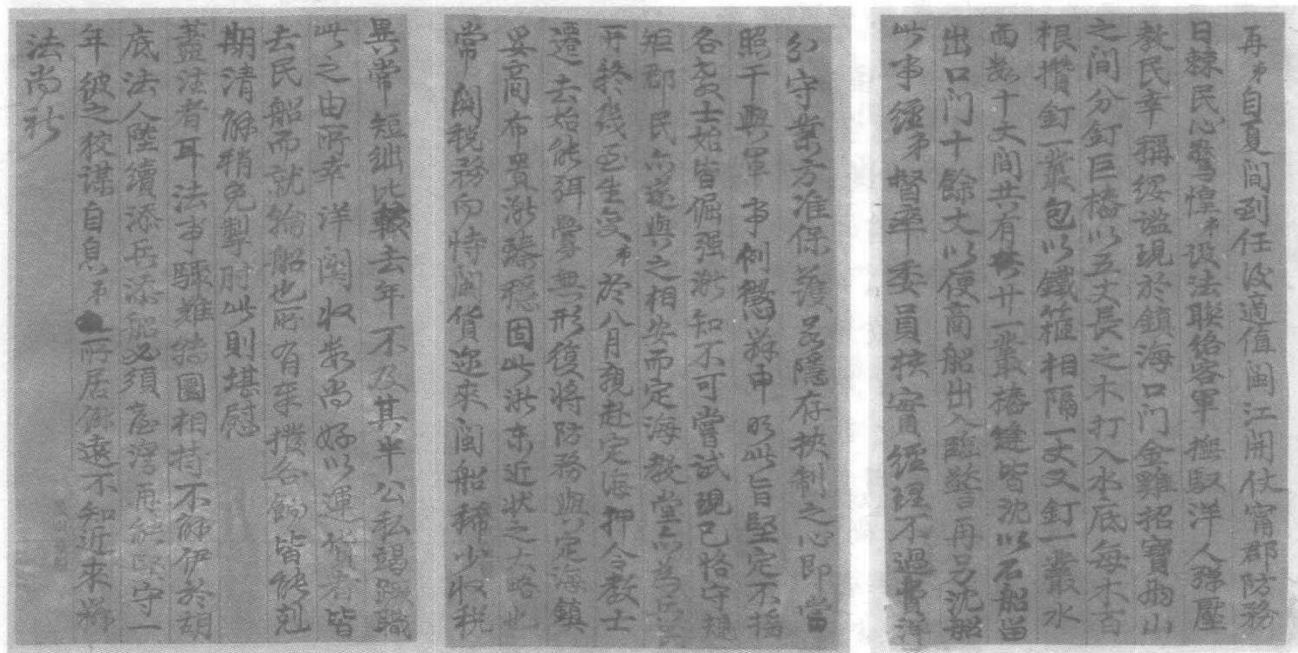
注:

[1]《太常袁公行略》(清光绪三十一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)第3页载:“供职农部十有六年,大司农阎文介公尝语人曰,吾部袁司官素讲求学问,故事无巨细,多所咨询,造各省征信册、编印光绪六年后岁计簿册,悉委诸公。”

[2]光绪九年六月,李鸿章奏请准河南补用道薛福成暂留北洋差遣,得到允许,参见《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》(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)第103页。

三

(见图三)再,弟自夏间到任后^[1],适值闽江开仗,宁郡防务日棘,民心惊惶。弟设法联络客军,抚驭洋人,弹压教民,幸称绥谧。现于镇海口门金鸡、招宝两山之间分钉巨椿,以五丈长之木打入水底,每木百根攒钉一丛,包以铁箍,相隔一丈,又钉一丛。水面数十丈间共有廿一丛。椿缝皆沈以石船,留出口门十余丈,以便商船出入,临警再另沈船^[2]。此事经弟督率委员核实经理,不过费洋七千元。两岸炮台屡次修改,渐能得法。如此则以台护椿,以椿阻御敌船,使受岸上之炮。且陆营劲旅数千,操练纯熟,可以一战。而法人之在甬传教者约数十人,自法衅开后,兵民谣言纷起,每欲与之为难,而法教士亦动引七月初六日之上谕来责地方官以保护^[3],且以呼召法船隐相挟制。弟明告以如能听官约束,乃为安分守业,方准保护,若隐存挟制之心,即当照干与军事例惩办,申明此旨,坚定不摇。各教士始皆倔强,渐知不可尝试,现已恪守规矩,郡民亦遂与之相安。而定海教堂亦为兵民所疑,几至生变。弟于八月亲赴定海,押令



图三

教士迁去,始能弭衅无形,复将防务与定海镇妥商布置,渐臻稳固^[4]。此浙东近状之大略也。常关税务向恃闽货,迩来闽船稀少,收税异常短绌,比较去年,不及其半,公私竭蹶,职此之由。所幸洋关收数尚好,以运货者皆去民船而就轮船也。所有奉拨各饷,皆能克期清解,稍免掣肘,此则堪慰荅注者耳。法事骤难转圜,相持不解,伊于胡底。法人陆续添兵添船,必须台湾再能坚守一年,彼之狡谋自息。弟所居僻远,不知近来办法,尚祈密示一二。英美两国使席现定何人,亦望示知为感。总署堂官章京住址单既隔半年,恐难吻合,如有新单,幸希惠赐一通。兹乘王弁解饷之便,薄致各处炭敬^[5],附上一单,以备查核,并望将姓名住址开示王弁,俾得照单分致。又查前任旧簿,有送户部贵州司清档房管税册司官二位各炭敬一分,兹请亦将其姓名住址示知王弁。琐费清神,歉悚无似,再颂勋安,不尽欲言。弟福成又顿首,十一月初十日。

注:

[1]光绪十年正月初十日,薛福成补授浙江宁绍台道员,闰五月十九日抵达宁波,二十一日正式接任。参见《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》(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)第99、110页。

[2]在镇海口门钉椿以拦阻敌船的办法,此前宁镇海防营务处杜冠英曾做过实验,后因款项难筹而中断。薛福成抵达镇海后,考察了镇海口门的地势以及潮水的涨落情况,决定仍然采用钉椿沉船的办法抗拒敌船。“据杜丞拟称,中间约留缺口十丈,以便船行,而于两边各钉椿木,椿木二三十根,钉作一丛,每丛相隔数尺,横排水面,要使敌船不能闯过,估计之料约须洋银七千数百圆之谱。”在与欧阳利见、杜冠英、宗源瀚等人商量后,薛福成决定将中间的船路由十丈改为十五六丈或二十丈,以便本国兵船、商船的通行。此办法上奏后,浙江巡抚刘秉璋基本同意上述办法,但是认为每丛相隔数尺似乎过密,应该改为相隔丈许钉一丛。从薛福成这段话来看,最终钉椿的实际做法是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而确定的。参见《浙东筹防录》卷一《禀抚院刘(光绪十年六月初二日)》和《禀督抚院南北洋大臣夹单(光绪十年六月十二日)》。

[3]《德宗景皇帝实录》卷189载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日上谕中提到“著沿海各督抚严饬地方官及各营统领,将各国商民一律保护,即法国官商教民有愿留内地安分守业者,亦当一律保卫,倘有干预军事等情,一经查出,即照公例惩治。”(中华书局1987年版《清实录》第54册,第651页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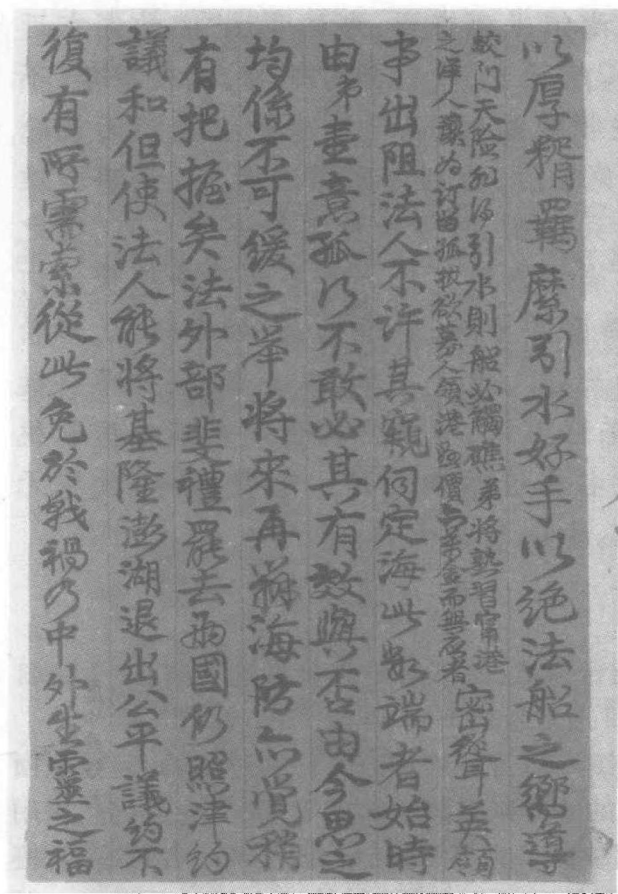
[4]宁波城内有天主教堂两处,为法国所派浙江全省主教的住址。定海有教堂七处。中法战争爆发后,有密报称见法国传教士刺探军情,民间又传言教堂内藏有大炮多尊。为防止传教士与法军勾结,薛福成将两地传教士迁至宁波江北岸或者上海暂住。参见《浙东筹防录》卷一《禀抚院刘(光绪十年七月十九日)》。

[5]炭敬:清代官场的陋规之一,地方官员出于打探消息、打通关节等方面的考虑,往往每年都会给京官送礼行贿,入夏送的称“冰敬”、入冬送的称“炭敬”,此外还有别敬、节敬、喜敬等等名目。

四

爽秋仁兄同年大人阁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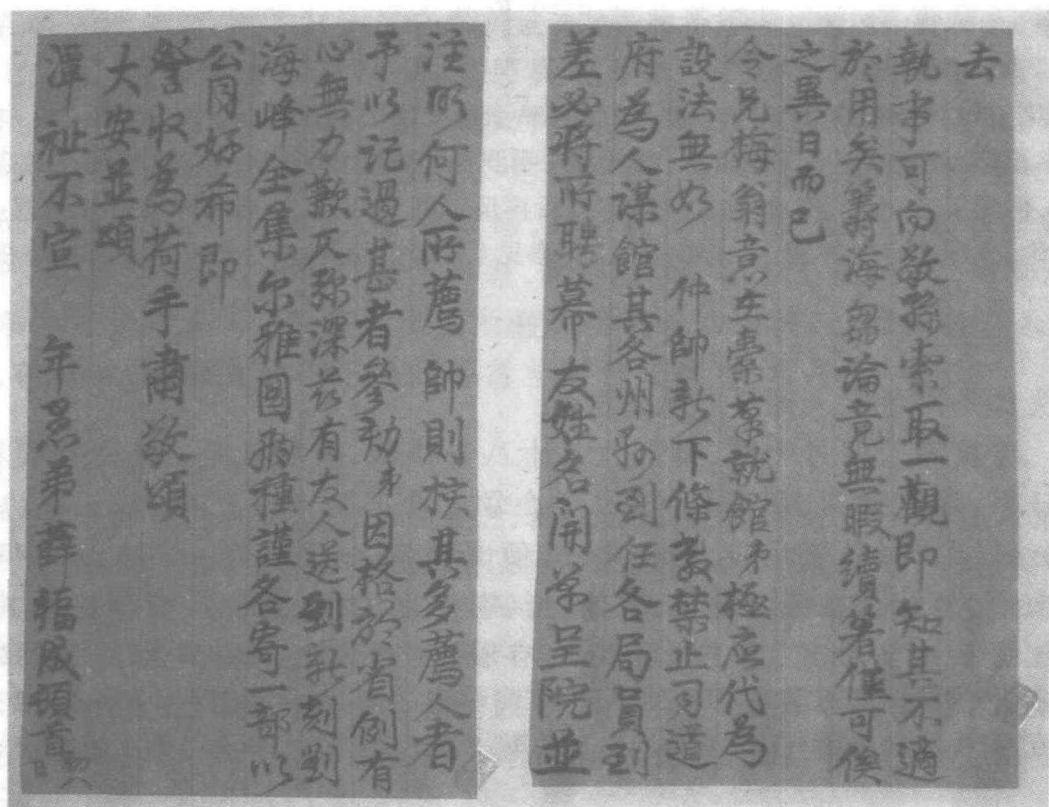
王弁回甬,接奉手毕,顷又奉到二月廿二日惠书,敬聆壹是。比惟潭祺休鬯,弗禄蕃增,以望实之并隆,卜勋猷之日懋,至为企颂。前致戔戔之敬,方以过于微



图四

薄，深用谦然，乃执事未经全纳，且王弁诸事生疏，多蒙指示，愧悚之余，弥殷感戴。法船至正月望日扑犯镇海口门，经炮台兵轮陆营合力迎击，连坏其黑白两兵轮，洞穿遁去，后又击沈其扑岸之舢板。敌以铁舰上之大炮连日遥对炮台轰击，其弹大至三百余磅。而各炮台经弟去年会商提台^[1]，悉皆改石为土，外盖草皮，与山色相似，使敌骤难辨为炮台，又筑长墙、设虚营以疑敌。此次巨弹或陷入泥土无一开花，或坠入长墙虚营之内，亦竟无一人损伤，彼遂不能测我虚实。自是敌之伎俩穷矣。至镇海口门宽百余丈，守御本无把握，幸弟去年稟请中丞^[2]，拨款排钉巨椿，兼沈石船，由弟督同委员竭数月之力而始竣事，用费不过数千金。此次抗拒敌船，获有凭依，颇著大效。他如勒迁教士以绝内应，添镇海电线以捷军报^[3]，豫以厚糈羈縻引水

好手以绝法船之向导^[4]，蛟门天险，非得引水则船必触礁，弟将熟习宁港之洋人豫为订留，孤拔^[5]欲募人领港，悬价六万金而无应者，密聳英领事出阻法人，不许其窥伺定海。此数端者，始时由弟壹意孤行，不敢必其有效与否，由今思之，均系不可缓之举。将来再办海防，亦觉稍有把握矣。法外部斐礼罢去^[6]，两国仍照津约议和^[7]，但使法人能将基隆、澎湖退出，公平议约，不复有所需索，从此免于战祸，乃中外生灵之福也（见图四）。湘文太守遽尔奉讳^[8]，弟又少一帮手，为之怅然。承赐去年度支出入总册，此系外间难得之书，而执事割爱见贻，纫感奚似。篇内略有须校正者，如各关所解南北洋经费及出使经费之数，只据各关报解之册为凭，然报解或迟或速，或积数结始一解。其年内所解之数，原系适然之数，而未可视为定数。譬如浙海关一年收税银七十万两，则南北洋二成经费各应解十四万两，共除去四成廿八万两，尚剩六成四十二万两，就中提出一成半作为出使经费，则须解银六万三千两也，其余各关皆可以此类推矣。拙纂《各省财赋考略》究以限于闻见，疏漏不可名状。顷因袁敬翁屡书来索，姑为钞一分寄去，执事可向敬孙索取一观，即知其不适于用矣。《筹海刍论》竟无暇续著^[9]，仅可俟之异日而已。令兄梅翁意在橐草就馆，弟极应代为设法，无如仲帅新下条教，禁止司道府为人谋馆，其各州县到任、各局员到差，必将所聘幕友姓名开单呈院，并注明何人所荐。帅则核其多荐人者予以记过，甚者参劾。弟因格于省例，有心无力，歉仄弥深。兹有友人送到新刻《刘海峰全集》、《尔雅图》两种，谨各寄一部，以公同好，希即察收为荷。手肃，敬颂大安，并



图五

颂潭社不宣。年愚弟薛福成顿首，初八日（见图五）。

注：

[1]提台，即欧阳利见（1825-1895），字赓堂，湖南祁阳人，时任浙江提督。

[2]中丞，即刘秉璋（1826-1905），字仲良，安徽庐江人，时任浙江巡抚。

[3]宁波至镇海水路有六十里，陆路有四十里。在宁、镇之间架设电线，宗源瀚此前已有提议，但是由于上海电报总局估价五千圆，数目太大，难以筹措，便不了了之。薛福成到任后，上奏刘秉璋，一方面进一步陈述架设电线的重要性，另一方面建议选择大北公司负责架设电线事宜，从而可使造价降低近一半。此事不久便得到刘秉璋的批准。参见《浙东筹防录》卷一《禀抚院刘（光绪十年八月十三日）》。

[4]宁波有外国引水员二人：必得生和师密士。两人经常在镇海口外驾船游行，以备雇佣。为防止两人被法国舰队所雇佣，薛福成与两人商定：地方政府支付两人每月各约一百五十元，两人承诺不受雇于法国人，并只在镇海近海口一带活动。另外，上海又有两名外国引水员对浙江海面比较熟悉，分别是英国人赫尔和德国人贝伦。薛福成电请江海关道员，提前与两人订立合同，支付一定的报酬，要求他们不得受雇于法人。参见《浙东筹防录》卷一《禀抚院刘（光绪十年六月初三日）》和《禀南北洋大臣督抚院（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一日）》。

[5]孤拔：法国海军将领。

[6]斐礼，即茹费理（1832-1893），又译为费理，中法战争时期任法国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。1885年3月，法军在镇南关大败之后，茹费理内阁随即倒台。

[7]此“津约”指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国舰长福祿诺在天津签定的《中法简明条款》。不过该条约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不久以后法军与清军又爆发了新的冲突。

[8]湘文太守，即宗源瀚（1834-1897），字湘文，江苏上元人，时官宁波知府。薛福成在《浙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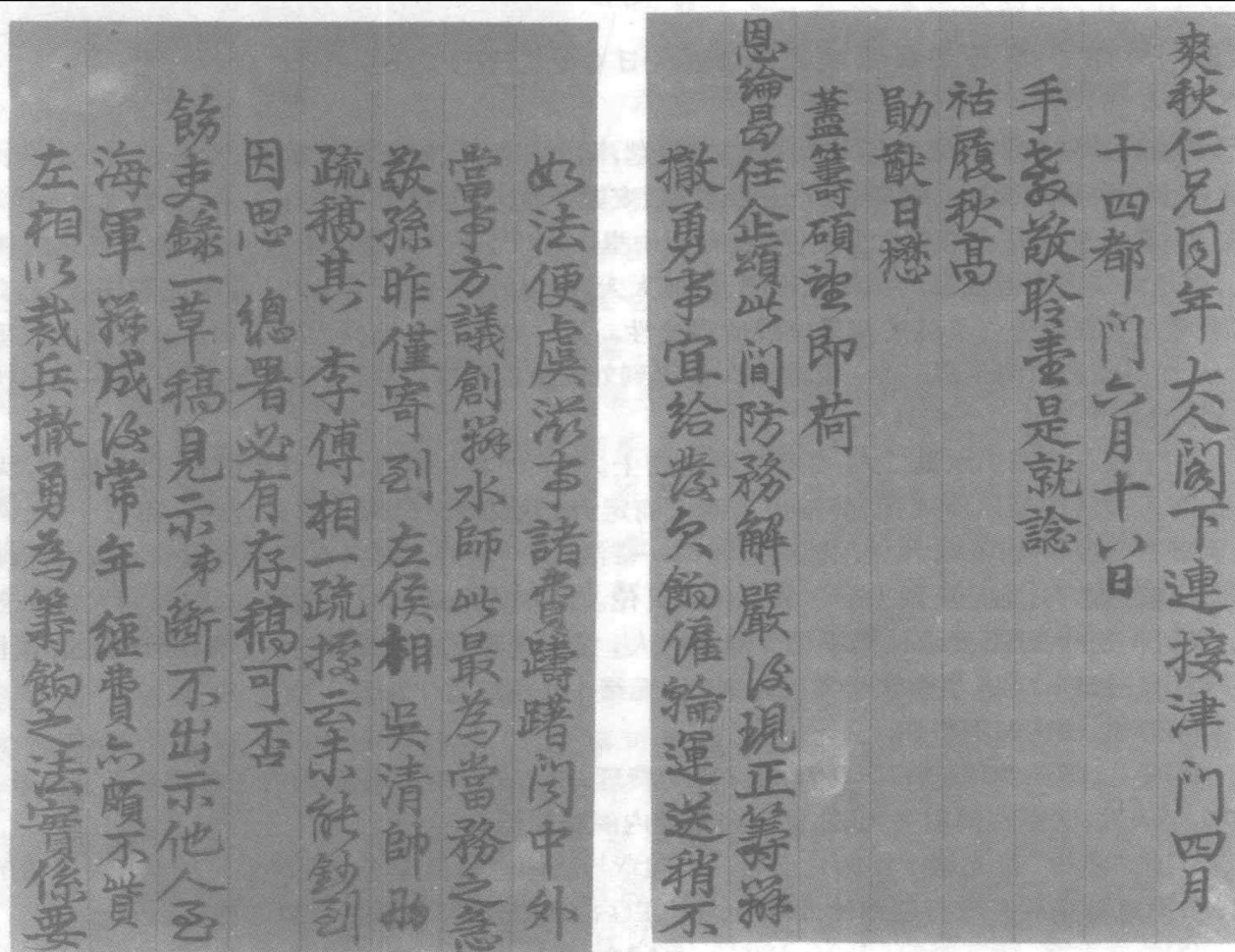
筹防录·序》中称赞宗源瀚道：“其佐理营务者，则有知宁波府上元宗君源瀚，治行焯著，识略颇闳”。

[9]光绪五年，针对“是时日本势益张，而西洋德意志诸国，方议修约事，议久不协。俄罗斯踞我伊犁，索重赂，议者大汹汹”的情形，薛福成“网罗见闻，略抒胸臆”，撰著《筹海刍议》十四篇。此书一出，得到了李鸿章等人的首肯。多年以后再反观此十四篇，薛福成并不十分满意：“余谓此持一时私论，大端所宜发挥者，十未得一二。”参见《筹海刍议》（清光绪十年刻本）薛福成自序。

五

爽秋仁兄同年大人阁下（见图六）：

连接津门四月十四、都门六月十八日手教，敬聆壹是。就谗祜履秋高，勋猷日懋，荃筹硕望，即荷恩纶，曷任企颂。此间防务解严后，现正筹办撤勇事宜，给发欠饷，雇轮运送，稍不如法，便虞滋事，诸费踌躇。闻中外当事方议创办水师，此最为当务之急^[1]。敬孙昨仅寄到左侯相、吴清帅两疏稿^[2]，其李傅相一疏据云未能钞到，因思总署必有存稿，可否飭吏录一草稿见示，弟断不出示他人。至海军办成后，常年经费亦颇不貲。左相以裁兵撤勇为筹饷之法，实系要著。弟往年亦持此论，兹将癸未冬上阎公书钞上^[3]，质正高明。承示《居安



图六

思危宜修可凭之台堡为不拔之基扃》，与鄙意不谋而合。弟夏初上中丞稟稿钞上一阅，中丞意亦深以谓然，曾经奏请将浙省新加洋药捐项留作海防善后之用，虽奉旨俞允，未知部议究竟如何。今年东南各省水灾甚重，防务方了，赈务又兴，何近岁天下之多事也。兹寄呈鄞人新侵《说文》四种暨阳明碑帖一纸以当晤谈，亦因堆积，各有数部，故聊以分饷也。又度支册承赐钞本，又寄刊本，至为纫感，今特将钞本奉缴，希即察收。新订《载书》似均妥洽，惟第七条不能无疑义耳。张樵野星使所带参赞随员内有许珏、钱广涛二人否^[4]？手泐，敬颂筹安，顺贺秋禧不具。年愚弟薛福成顿首，八月十一日。

注：

[1]中法战争后，清廷鉴于海上力量的缺乏，着手大力发展水师。光绪十一年五月，朝廷在上谕中要求张之洞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人就船厂建设、炮台设置、将才遴选、经费筹措等问题发表意见，进行讨论。不久又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军机大臣、总理衙门王大臣和醇亲王。参见姜鸣著《龙旗飘扬的舰队》（三联书店2002年版）第205-206页。

[2]左侯相，即左宗棠（1812-1885），字季高，湖南湘阴人，清末重臣，拜东阁大学士，封恪靖侯。吴清帅，即吴大澂（1835-1902），字清卿，江苏苏州人，曾任太仆寺卿、太常寺卿、左都御史、广东巡抚、河道总督、湖南巡抚等职。

[3]当指《庸庵文编》卷二的《上阎尚书书》。在该文中，薛福成有感于当时户部每年支出巨大、形势岌岌可危的状况，认为在各种费用中，“而漏卮之最大者，则在于养兵”，因此主张“为今之计，惟有淘汰绿营”，“至于添练轮船水师之处，其原设艇船水师，亦少实用，可渐裁也”。阎公，即前述的阎敬铭。

[4]光绪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张荫桓受命出使美、日、秘三国，随从人员中有“举人许珏号静山”、“荫用知县钱广涛”。参见张荫桓所撰《三洲日记》卷一的记载。张荫桓（1837-1900），字樵野，广东南海人，曾出使英、美、法、德等国，官至户部侍郎。许珏（1843-1916），字静山，晚号复庵，江苏无锡人，光绪十一年随张荫桓出使美、日、秘三国，十五年薛福成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时曾任参赞，二十八年任驻意大利大使。钱广涛生平不详。

整理者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